

Recreating Space: The Modern World View Construction of *Xiang Daily* and its Influence on Hunan Culture

Yang Haihong Wang Zeyu

Abstract: In the Hunan New Policy Movement, Hunan gentry founded newspapers such as the *Xiangxue New Newspaper* and *Xiang Daily*, d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worldview of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from three aspects: natur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and showcasing a new picture facing the world. The modern worldview has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regional consciousness in Huna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Hunan intellectuals, reshaped the cultural power order in modern China, opened up a path for Hunan intellectual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go global, and formed the Hunan culture of daring to b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Key words: *Xiang Daily*; Modern worldview; Hunan culture

课题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晚清湖南报刊史及其史料整理研究”（1897-1911）（20ZDB011）。

作者简介：阳海洪，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论、影视批评与文化；王泽宇，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引用：阳海洪，王泽宇. 再造空间：《湘报》的近代世界观建构及其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4, 5 (1): 18-29.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1002>

再造空间：《湘报》的近代世界观建构及其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阳海洪 王泽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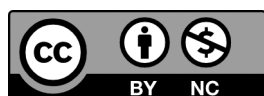
摘要：在湖南新政运动中，湖南士绅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等三个层面解构了“天下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展示了面向世界的崭新图景。近代世界观推动了湖南地域意识的觉醒和近代湖南知识分子的崛起，重塑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权力秩序，为湖南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走上世界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

关键词：《湘报》；近代世界观；湖湘文化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世界观是人类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人类对周围空间环境的认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开始的，并在这种自我体认中，形成自己的民族特性、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政治性质是影响国体、制度性质和国民性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而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共同体形成的第一动力。”^①华夏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周边民族在血统、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创造了“华夏”“中国”等称谓来进行自我指称，而将周边民族命名为“夷”“四夷”“蛮夷”。“天下中心”世界观认为，“天子”居“中国”（天子直接控制之区域为“中国”）之中心，

^① 陈明明. 作为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政治学：经验、历史及其意义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 (5): 86-92.

四周是拱卫天子和中国的“诸夏”（诸侯之国），“诸夏”四周是尚未开化的“四夷”，由此构成了一个体现文明等级秩序的天下体系。作为自然空间的“中国”，具有地理（中原地区）、政治（天子之国）、民族（华夏民族）和文化（儒家文明）的多重内涵，兼具“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和“文明中心”三重属性，是中国古代“认知自我、认知所处地理环境，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构想，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宗教情感，也与人们的实际地理知识有密切的关系”^①。鸦片战争之后，天下中心观被彻底解构：作为国际交往的天下秩序，被主权国家构成的“列国竞争之世”所代替，中国作为建立高度文明的惟一存在，被彻底颠覆；作为政治实体的王朝国家，被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所代替。“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②随着西方地理学的进入和中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知识界开始建构新型世界观，重新想象中国与世界的空间关系和文明秩序。在此转型过程中，作为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报刊，在推动近代世界观转型及其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③

湖南“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④。湖南深受“四塞之国”的地理空间的影响，既“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开一代之风气”，又“风气锢塞”，“民性倔强”，容易滋生封闭自大、盲目排外心理。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落后，但在湖南新政运动中，湖南士绅群体敏锐感知到了民族危机，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等近代报刊，构建新型世界观念，推动空间话语转型，重新定义“世界”“中国”与“湖南”的空间关系，在“世界”语境下想象“湖南”，以“湖南”拯救“中国”，对于近代湖湘文化转型和士人精神气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列国竞争之世”：报刊与新型世界观的建构

在天下中心观的影响下，中国文献对世界的描绘和书写不科学也不真实，扭曲了中国士人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加深，中国知识界通过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刊，逐步感知到了中国之外的“西方”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不承认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并“以异国形象的眼光来建构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尊华卑夷

① 吕建福. 佛教世界观对中国古代地理中心观念的影响[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75-82.

② [美] 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郑大华, 任菁,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4.

③ [英]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67-68.

④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5: 1.

的心态十分明显”，^①但它们“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增长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情况的了解，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之情，同时，对改变当局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扭转人们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思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②在推动中国地理学转型和近代知识分子世界观建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海国图志》中“名言至论，类多切中时弊，可以见之施行。至于各国之沿革始末，政治风俗繁征博引，搜罗宏富，尤非小儒所能及，诚谈海国者之洋洋大观也”。^③湖南近代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放弃“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念，开始以“国家”为中心，重新想象世界，并在万国林立的世界中安放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位置。

（一）从“中心”到“边缘”：作为自然地理的世界观

近代地理学颠覆了知识分子天圆地方、中国居于中央的世界观念。谭嗣同以生活经验说明，地球是圆的，改变了传统天圆地方的地理观。皮嘉祐说：

几人称帝几人王，地球环列数十邦。各国都有君与长，中外不必两样看。中国虽然是华夏，开辟最先胜蛮野。实因礼义与文明，人人推尊事不假。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西洋英俄德法美，欧洲各国争雄起。纵然种族有不同，何必骂他是鬼子。^④

中国不是“宅兹中国”的中央之国，只是占地球“数十分之一”的普通之国。“中国之在全地球不过数十分之一，而欲以抗衡泰西各国不亦戛戛乎其难哉？”^⑤熟悉中国地理虽具优先性，但也要观看世界地图，掌握世界地理。“看图宜先中国次外域也。西人所谈五大部洲，本宜遍知。第中国为身所生长地，又古圣贤皆产此，四书群经皆及此，识得便有实用。至看外国《瀛寰志略》中所绘五洲分图甚好，然亦但以记得各国之名，各国之部位为首”。^⑥世界各国地理开始居于与中国地理同等重要的位置，知识分子要积极阅读报刊，以通中外之情，了解世界发展大势。

（二）从“天下”到“国家”：作为政治地理的世界观

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民族国家，孕育于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是按照理性精神和权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天生具有竞争性的意识”。^⑦但传统天下中心观只“把民族和国家当

① 管新福.《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的异域书写[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6.

② 胡乐凯,宋永林.评魏源的《海国图志》[J].出版广角,2017(15):81-83.

③ 田梓材.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A]//江标.沅湘通艺录.长沙:岳麓书社,2011:150.

④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2.

⑤ 易抱一.说西南洋之华民[A]//江标.沅湘通艺录.长沙:岳麓书社,2011:127.

⑥ 姚炳奎.拟教初学者通輿地之学条例浅说[C]//江标.沅湘通艺录.长沙:岳麓书社,2011:155.

⑦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3.

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①缺少现代国家的功能与国际对抗性。甲午之后，作为一种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心理，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认为面对“列国竞争之世”，变法是“古今之公理”。“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②中国要将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推进到制度层面，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富国强兵，提升国家竞争实力，才能挽救民族危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基本动因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也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驱动因素。“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前，像郭嵩焘、王韬、郑观应、洪仁玕等一小批人愈来愈为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观所吸引。”^③甲午之后，中国知识界延续了晚清以来这种“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在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地广民多，但并不是现代国家。“今中国官自为官，民自为民，士自为士，工自为工，农自为农，商自为商，故今日谓中国为四万万人之国，亦无不可”。^④作为“时代骄子”的梁启超，第一次将中国的民族情感与建国意愿明确而清晰地表达出来，并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⑤并称赞“民族主义”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⑥

主权是民族国家独立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两种主权产物，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民族主权，即各民族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都是主权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人民主权，即民族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⑦“中国微弱，四夷交侵”的民族危机和波斯、埃及和印度等文明古国在丧失民族主权之后的悲惨境遇，使湖南士绅忧惕自警。中国变法维新的目的，“不过止于存中国，保教种，勿使数千年神圣之区一旦殄灭以渐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而已”^⑧。在湖南士绅看来，所谓“国者”，“该括一切所属之地，无论远近，皆用本国律法治之”；“凡国但有民权、

① 朱其永. “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J]. 学术月刊, 2010(1): 49-54.

②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8.

③ [美]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M]. 雷颐, 罗检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41.

④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18.

⑤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4.

⑥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0.

⑦ 郑永年.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中国向何处去[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12.

⑧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7.

国权能管理界内一切人民、物产，即能与他国议战议和”，才能成为“自主之国”。^① 具体而言，“自主之国”关涉如下主权：

一能增改其国政，他国不得与闻；二能管辖国内之属地，他国不得占据，国内所有产业由本国自理，不准他国阻挠；三能自保其国，预备战守之法；四能振兴国内商务，俾致富强；五能于界外得新地以为属国；六有全权管理一切人物，即在本国界外者亦能管理；七应保护本国之人，任往何国，如两国人负欠债项，可以理问，此西人自主之公例也。^②

“等国等权”的主权观念，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在《湘报》看来，国家唯有具备对国内外事务的垄断权力，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并进而主张以“民权”为基础，将中国改造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特征的主权国家，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地位，挽救中华民族的沉沦。“等国等权”的主权意识和民族国家观念，使湖南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能以天朝上国身份凌驾于“四夷”之上，而是要遵守国际法，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公法者，世界上人数相维相系之大经大法，亦即前后古人心中相亲相爱之公性情。”^③《湘学新报》《湘报》在建构近代世界观念时，强调中国要遵守国际法，并自觉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准则和传统惯例，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各国之要求我而无厌者，可据公法以拒之；我之要求各国而不允者，可据公法以争之；向之受欺于各国，损我利权者，并可据公法以易之。”^④在“身处列国竞争之世”的时代，湖南知识分子将国际法作为“平万国权力者之根原”，主张在平等基础上与西方展开和平竞争，以建立一种对等型的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民族国家格局。

（三）从“天下”到“世界”：作为文化地理的世界观

在传统世界观看来，“天下归仁”，“天下中心”世界观是与“仁学中心”文明观相匹配的。在洋务运动中，中国也曾尝试“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原则，^⑤推动中国现代化改革。但甲午之战表明，贫弱是不能成为文明的辩护词的，“大凡有学问之人必能制伏无学问之人，而无学问之人自然不能不受制，此世界之公理也”^⑥。甲午之后，随着地理科学对“中央之国”的祛魅以及民族国家对王朝国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优势，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的世界观也随之动摇。中西交通的事实表明，“西人讲究伦常且更精更实”。^⑦

① 唐才常撰，王佩良校点。唐才常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93-94。

② 唐才常撰，王佩良校点。唐才常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90-91。

③ 《湘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4。

④ 《湘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5。

⑤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选录[C]//《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8。

⑥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8。

⑦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7。

中国要放弃华夷尊卑的文明等级观念，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在“据乱世尚力，升平世尚智，太平世尚仁”的进化史观中，“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君与民予以公权，故西国议民弗若君者为公罪，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①在这里，唐才常的进化史观将作为中国文明的区域史纳入世界文明史的普遍视域中，认为世界各民族文明都要经历相同的现代化过程。西方的政教文明更加契合“仁政”标准，更有资格居于文明中心地位。甲午之后，中国知识界越来越从制度性、结构性层次来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认为文明才是支撑西方“舰炮之利”和“商贸之兴”的根本，表明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的认识已然深化到工业文明背后的制度建设和学术体系。中国“数十年派学生，立学堂，设译局，筹所以谋自强、敌外人者，曰兵也商也，而国家曾不收一草一木之效者，何也？一言以蔽之，曰不学之故也”。^②“兵也商也”的洋务运动，其收效甚微的原因，是“不学”之故。中国惟有与西方“学战”，推进制度建设、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才能融入世界，并挽救民族危机。在《湘报》看来，将中国建设成“真豪杰之国”的途径是“揭出兵战商战不如学战之旨”，“志在新学、强学”，建立现代国家，以“昌明种教”，^③“学”“政”“教”成为理解知识分子想象西方文明和构建新型知识的三个关键词。谭嗣同指出，“学”“政”“教”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格致——政务——教务”是“进学之次第”。尽管他强调“求保国之急效，又莫捷于学矣”，但“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学亡。故言教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其政术学术，亦或反为杀人之具”。^④在谭嗣同看来，“学”“政”“教”彼此依存，但他“不惟赋予‘教’”高于‘政’‘学’之地位，谭嗣同也确信各‘教’不无相通之处”。^⑤易鼎则突破“中体西用”藩篱，提出了中国由弱变强的“四策”：（1）“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也”）；（2）“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也”）；（4）“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⑥易鼎的观点虽然激进，在当时惊世骇俗，但指出了如下的无奈事实：现代世界是由西方建构并控制的，中国必须“进入”这个世界，才能挽救民族危机。而一旦放弃天下秩序而进入世界体系，就必须破除畛域，接受“世界逻辑”（实际上是西方逻辑）的改造，推进文明的深度融合。“由于两种秩序或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差异，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承认，势不能不同时对已长期存在的内在体

① 唐才常撰，王佩良校点。唐才常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93。

② 《湘报》报馆编。湘报·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37。

③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497。

④ 谭嗣同。谭嗣同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375。

⑤ 章清。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J]。近代史研究，2017（5）：35-62。

⑥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3-155。

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①

二、“中国变法自湖南始”：近代世界观对湖湘文化的历史影响

空间不是抽象空洞的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关系和意义价值的生产场域。“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②空间关系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秩序是权力秩序的物化形态。《湘学新报》《湘报》通过“学”“政”“教”等知识话语的建构，解构了“天下中心”世界观，主张中国要学习西方政教文明，以现代国家身份进入国际秩序。历史以来，作为“四塞之国”的湖南，“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在中国历史上籍籍无名。湘运之兴始于湘军。湘军崛起，使湖南成为“近代中国绅士阶层数量发展最快、绅权势力最重的省份之一”。^③天下秩序的崩溃和地方绅权的膨胀，刺激了湖南地域意识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中央权威下坠的，往往是藩镇割据势力的兴起。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现代化改革事业需要领导力量。“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始。”^④近代湖南与藩镇割据不同，而是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湖南人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湘报》所建构的新型世界观，使湖南士绅将“湖南”置于“世界”的历史坐标中进行审视，建构了积极能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由此绳定湖南人的精神气象，“铸就了一种勇于任事、锐意进取、经世致用的湘学精神”。^⑤

（一）近代世界观促进了湖南地域意识的觉醒

1. “有萨长肥土之风”：在“世界”定位“湖南”。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解决它本身所提出的问题。《湘报》所建构的新型世界观，使湖南士绅得以突破中国天下秩序的思想禁锢，在“世界”定位“湖南”的历史定位。近代以来，德俄日等国家通过变法走向富强的强国路径为湘人提供了现实样板，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等西南诸藩为基地，并进而扩至全国的成功经验更是给予湘人以巨大刺激。湘人希望像日本之萨摩与长洲一样，在湖南积极实行维新变法，由此带动其他各省，将中国建设成如日本一样的强大国家。“故以吾湘，方之日本萨摩党，庶几近之；而尤愿其热力所充，直充至于救世同仁，以为文明太平之起点，

① 罗志田. 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 [J]. 文化纵横, 2010 (3): 26-33.

② 李春敏.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 [J]. 人文杂志, 2011 (1): 62-68.

③ 阳信生. 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54.

④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27.

⑤ 张江洪. 近代湖湘妇女运动与湘学精神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 124-128.

则中国其庶几乎！”^①“法人之称德也，以为初出地平之星，不可量其轨道。英人之称日本也，以为飘轮之骤起”；“湖南虽贫国，然士气慷慨尚侠，有萨长肥土之风，腹地居中，与欧洲日耳曼为近”，湖南将会如德国、日本一样，成为中国民族复兴中的“初出地平之星”和“骤起之飘轮”。^②在变法过程中，湘人要勇敢承担民族救亡之责任，抱定牺牲之决心。“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权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③

2. “营一隅为天下倡”：以“湖南”拯救“中国”。为激发湘人敢为人先的责任意识，《湘报》列举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先贤济时拯世的事功和“求变”“善变”的精神。“船山、默深诸公，以文学开风气；曾、左、胡、江、罗、李，以武功致中兴。于是四方推重湖南为人才极盛之地。固由地气转移所致，亦由乡先生之善变也。如不变，则终如古南蛮而已矣。”^④在全国因风起未开，改革举步艰难的情况下，湖南人要效法曾、左、胡等地方先贤，挺身而出，“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⑤与《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不同，《湘报》具有非常显豁和自觉的“湖南”意识，始终回荡着以救国为己任，挽中国于既倒的豪情侠气。“吾湘以士气闻天下，通商数十载，西人足迹交遍于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论者谓志气之盛，魄力之厚，视日本之言锁港者，殆将过之，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宁有让焉！”^⑥

（二）近代世界观推动了湖南知识分子的崛起

在“天下中心”世界观与“仁学中心”文明观中，儒家典籍承担社会创序功能。“‘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⑦在典籍中心的权力秩序中，官报和民报都是服务于皇权的信息舆论工具。“其从业者对封建政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不具备独立的职业品格，因而不可能构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⑧作为印刷资本主义产物的报刊，解构了官报时代以君权为中心的权力秩序，构建了一个以“报人”和“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并借助读者群，形

①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6：50.

②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14.

③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15.

④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6：636.

⑤ 陈寅恪. 寒柳堂集[M]. 北京：三联书店，2001：176.

⑥ 梁启超. 湖南时务学堂缘起[C]//《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 戊戌变法（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492.

⑦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6.

⑧ 程丽红. 清代报人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4.

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报人取代传统士人，拥有了深入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力量，具有维新意识并掌握了新型知识和传播媒介的士绅成为领导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主体。“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①

1. 由“士人”而“报人”：权力秩序的重组。近代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的最大区别，是中国放弃了“三代之治”的政治想象，面向世界的外倾目标成为国家的政治诉求，儒家典籍无法承担近代中国的创序功能。中国需要通中外之情，知世界之势，重建知识体系和文明逻辑。报纸传播迅捷，“处四海如一家，等千里于咫尺。”^②内容宏富，“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③且出版周期比书籍短，是认知世界、学习新知的最好中介。“书而新，势必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而后可也。然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其构意也有日，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又有日，此书之寓吾目，则去其初著书之时，不知凡若干日。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有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而书亦非新书矣”。^④在《湘报》的近代世界观建构中，现代国家是以人民主权为根本原则的，记载皇帝起居注的古代史籍只是“一家一姓之谱牒”，与“闾里琐细”和“国计民生”无关而报纸则可全面刊载民众生活，表达人民呼声。在对报刊的再价值化与合法化过程中，作为新知载体和“民史”“国口”的报刊，取代儒家典籍，承担着近代中国的创序功能。“故列国纷争，全球鼎沸，以报章之多少觐国力之涨缩，以报之唯否考民议之从违，以报之曲直验人心之离吸”。^⑤《湘报》在近代世界观中重新审视与定位报刊，改变了报刊在湘人心目当中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启蒙角色使其成为文人论政的载体，使仕子们承接了心忧天下、报国成仁的传统”，^⑥使现代报刊真正融入湖湘文化。

在湖南新政运动中，随着《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文化机构的创办，具有维新意识的湖南知识分子迅速向这些机构聚拢，在造成士林分化的同时，重组文化权力秩序。“以熊、谭、唐等‘后辈’聚合而成的‘新派’为中心，势必形成人数众多，观念一致的共同体，在湖南士林中，重塑新的人脉网络”。^⑦报刊、学会和学校相表里的新型聚合机制，为政党政治出场提供了可能性。在《英国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说党》等文章中，“政党知识”和“政党

① 《湘报》报馆编。湘报·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975。

② 《湘报》报馆编。湘报·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975。

③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④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81。

⑤ 《湘报》报馆编。湘报·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5。

⑥ 赵云泽，杨若玉。清末国人自办报刊的启蒙角色[J]。新闻春秋，2016（11）：41-45。

⑦ 朱至刚。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J]。学术月刊，2013（3）：149-156。

手段”成为湖南士子的关注对象。“论党于今日，士民由党，农民由党，公民有党，商民有党，此以业为党也；天学有党，地学有党，法学有党，形学有党，此以事为党也；有君主之党，有民主之党，有守旧之党，有新旧交攻之党，此以政为党也”。^① 这些文章虽对政党政治的理解还存在谬误之处，但否定了“君子不党”的古老传统。由“士人”向“报人”转型、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型，成为天下中心世界观崩溃之后湖南权力文化秩序重组的重要面向。

2. 由“崇古”而“求新”：价值观念的重构。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世界观与方法论，世界观与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湘报》解构天下中心世界观，在于要突破华夷之辨，树立以求新求变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为湖南新政运动扫清道路。唐才常以西方自然科学内容来证明世界本源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在中国传统“变易论”中纳入西方进化论思想，论证日新之道的科学性：“地球之生，由流质而定质，由定质而凹者海、凸者陆，有凹凸而大草大木大鸟大兽而猕猴，由猕猴而野番部落，而打牲游牧，而人世界，而多君，而一君……而一言以蔽之曰：日新而不已。”^② 在《湘报》看来，世界“新”“旧”变化永恒的，也是辩证的，因而赋予“华夷之辨”以时代内涵，“中华”“中国”不再是与“地域”相联系的固定文明形态，而是一种与时俱进，吸纳全球文明成果的博大胸怀。只有与时俱进，以开放心态吸纳新文明，才能成为居于世界文明中央的“中国”，并开拓属于本民族的“新”时代。“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新者忽旧，时曰新夷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③ 《湘报》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传统概念灌输了新的时代内容。其目的所在，旨在打破“华夷之辨”，扫荡中西之间的文化壁垒，为现代文明在中国出场扫清历史障碍。“中国之创新政求新法也，费五十年之时日，掷万亿兆之金钱，购恒河沙数之枪械，然而北胁于俄，南挫于法，东困于日者，何也？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也。欲新民必湘报新学，欲新学必新心。”中国要想成为现代国家，“欲开二千年来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④。

三、结语

中国是在创痛巨深的殖民侵略中由“天下”进入“世界”的。伴随这种民族情感，近代中国形成了三种世界观：“在‘落后挨打’状态下的悲情世界观，在国家崛起之际的孤傲世界观，平静谋划国家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理性世界观。”理性的中国世界观是“中国自己看作是万国

① 李固松. 说党 [A] //江标. 沅湘通艺录.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28.

②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16.

③ 《湘报》报馆编. 湘报·上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1.

④ 唐才常撰, 王佩良校点. 唐才常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337.

之一国，把万国视为与己平等的国度”。^①《湘报》所建构的世界观，就是这种理性世界观。蕞尔岛国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且是甲午之战中打败中国的敌人，但《湘报》既不为现实仇怨而纠缠，也不以历史关系为依据，而是放下虚骄之气，表示要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并以日本的“长洲”“萨摩”自比，要将湖南打造为中国变法维新的“排头兵”，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同时，在天下中心与仁学中心的传统世界观中，士人承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横渠四句）的责任。在“天下中心”那里，世界的意义来自超越性的“往圣绝学”，现实世界被“三代之治”的完美秩序所引领，“天下”观念成为儒家士大夫批评现实政治的理想性、超越性概念。“看”与“被看”是交互规定的，谁以理性观“世界”，“世界”也以理性对待他。《湘报》在为天下中心“祛魅”的同时，树立了“真理在世界中”的近代世界观。理性世界观强调真理存在于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与万物联系之中，人类只有面向世界，放弃成见，敢于求新求变，并深入现实，才能“穷尽历史、预测未来，乃至重建世界”。^②作为地域文化形态的湖湘文化，是一种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统帅和灵魂，是湖湘文化独具的特色和优势”。^③这种“思想文化”既依赖于湖湘理学文化、移民文化和流寓文化的陶铸，也得益于近代理性世界观的再造。在对世界的重新审视下，世界呈现出新型权力秩序与文明结构。作为地域的“湖南”被重新编织与定位，士人也得以重建集体想象与个人价值。新型世界观在扩大士人视野的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转型，学会、报刊和学校等文化机构也重塑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权力秩序，为湖南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走上世界开辟了道路，《湘报》角色“既具有‘士’的普遍文化意义，又具有从志士报刊到知识分子报刊过渡的特殊社会学样本意义”。^④

① 任剑涛. 走向理性：近代以来中国世界观的演变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2): 12-18.

② 张瑞臣. 近代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实质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 (2): 24-28.

③ 郑佳明. 湖湘文化的三重属性 [J]. 新湘评论, 2023 (14): 45-48.

④ 喻频莲. 中等社会的组织力量：《时报》（1904—1911）角色再认识 [J]. 新闻春秋, 2022 (6): 71-80.